

从《史记评林》到《史记读本》^{*}

——作为教材的《史记》与日本汉学教育

杨海崢

内容提要 作为日本汉学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史记》对日本的教育乃至日本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各个时期教育体制的不同以及不同读者群的需要,使《史记》在日本的刊刻和传播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期日本汉学教育的特点。

关键词 日本 《史记》 汉学教育

《史记》在奈良朝之前就已传入日本,至今已近1400年。《史记》的名称见于日本文献,最早是文武天皇的大宝元年(701)。此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将教育作为一项制度列入其中,对大学的体制有明确规定,《史记》被列入大学的课程之一。进入奈良朝(710—794)、平安朝(794—1185)后,《史记》流传更广,甚至成为天皇和朝廷大臣的学习用书。《日本三代实录》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

(贞观^①十七年〔874〕四月)廿八日庚辰,卯时,白雉见东北……是日,帝始读《史记》,参议从三位行左卫门督兼近江权守大江朝臣音人侍读。^②

另据《日本汉学年表》^③,镰仓时代(1185—1333)在天皇御汤殿举行的天皇读书仪式上,讲读《史记》有十四次,讲读的篇目包括《五帝本纪》《夏本纪》等篇。很多朝廷官员也研读《史记》,并深受影响和熏陶。镰仓时代,《史记》的《孝文本纪》《秦始皇本纪》《留侯世家》《孔子世家》等是供贵族讲读和研习的篇目,一直到江户时代仍然延续这一传统。

除宫廷教育外,《史记》在以汉学教育为主的学校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通常被作为必读的课本。创建于室町时代,有“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大学”之称的足利学校在校规中明确规定以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为课本,禁止讲授其他书籍^④。足利学校最盛的时期,在校学生的人数多达三千人。各地学子云集到这里来学习,再把学到的知识传播到各地去。这对《史记》等汉籍在日本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川幕府建立后,抑制佛教,奖励学问,倡导儒学。德川家康喜欢读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史典籍,推崇儒家思想,大力倡导朱子学,并使朱子学成为日本汉学的显学。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江户时代的《史记》学研究”(项目编号13BZW049)阶段性成果。

① 贞观为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清和天皇的年号,其在位时间是公元858—876年。

② 《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日本三代实录》后篇,日本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九年(1974)刊行,第361页。

③ 《日本汉学年表》,斯文会编,日本大修馆书店昭和五十二年(1977)刊行。

④ 王桂《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页。

(1646—1709)更为重视儒学,并将江户孔子庙所在地改称昌平坂,将林罗山创立的私塾改为由幕府直辖的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昌平黉(又名昌平阪学问所)。作为官方学部场所,昌平黉广招鸿儒,成为天下学府的中心。昌平黉的教学内容包括经书、史书和诗文,其中史书必读的是《左传》《国语》《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诸藩纷纷效仿昌平黉的模式,在各地开设藩校。《史记》作为史科的必读经典被传授,不仅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藩校学生,而且经过藩校直接传播到广大日本民众之中。

《史记》传入日本之初,印刷术尚未发明,学生们纷纷传抄《史记》。现在日本藏有平安朝以来流传下来的多个《史记》古抄本,可与今本《史记》比较以校定文字异同,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到江户初期,随着日本印刷术的发展,在庆长(1596—1615)、元和(1615—1624)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和刻活字本《史记》。这使《史记》的阅读变得容易,并促进了《史记》的传播。到江户中期,明代凌稚隆的《史记评林》传入日本,成为了最重要的《史记》读本和教材。

在中国,宋明学者始开评论《史记》的风气。明代学者评点《史记》的成果很多,据《史记评林》所列,自正德至隆庆年间(1506—1572)就有六十多家。这些成果对《史记》的评点主要集中在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编纂体例、文学手法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至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凌稚隆所辑《史记评林》,搜集整理明万历四年(1576)之前历代学者计一百五十余家的评论评点,汇为一编,成为《史记》评点之作的代表。

《史记评林》在《史记》正文相关句下抄录《史记》三家注,将各家评语及凌稚隆本人的考辨载于眉端,正文标识句读,每句每段的文法大义旁注于侧。对《史记》引用《诗》《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书而载之未详之处,凌稚隆将相关全文抄录于眉端,以备考证。后明代学者李光缙又进行了增补,对凌稚隆搜罗不全之处予以补充,使该书更加完备。

《史记评林》搜罗宏富,对后代学者大有裨益,如贺次君所言“凌氏博征古籍,一一撮而系之,后之学者参互审勘,不劳钩稽群册矣”^①。《史记评林》对扩大《史记》影响起了重要作用^②。《史记评林》不仅在编纂体例和资料搜集上成为了后世典范,也为后人提供了良好的底本。凌稚隆作《史记评林》时,对《史记》底本的选择也是非常慎重的。清人钱泰吉讲:“《评林》本,吴兴凌稚隆刻,藏书家不以为重,今以乾隆四年殿本校勘,乃知胜明监本多矣。”^③梁玉绳作《史记志疑》时选择《史记评林》为底本,是因为“《史记》刻本甚众,颇有异同,世盛行明吴兴凌稚隆《评林》,所谓湖本也,故据以为说”^④。贺次君也认为《史记评林》“《史》文及注,往往有胜于柯本及南宋、元、明诸刻者”(《史记书录》,第164页)。

《史记》是史学名著,也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代表,它不仅为后世正史提供了范本,而且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人将《史记》视为文章典范,其评点不限于《史记》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史记》的遣词造句、叙事方式、文章风格等方面也是其点评重点,即重在点评《史记》的“文章之法”“叙事之法”。这与日本学者一方面将《史记》作为史学经典,一方面又将《史记》作为为文典范,与从欣赏文学作品和学习汉文写作的角度来阅读《史记》的治学倾向十分吻合。

江户中期,《史记评林》传入日本后备受欢迎,因其收录《史记》原文、三家注及各家评点和注

①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61页。

② 王世贞《史记纂序》称:“《评林》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兖州续稿》卷四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82册,第560页)

③ 钱泰吉《校史记杂识》,《甘泉乡人稿》卷五,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绪十一年增修本。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自序,中华书局1981年版。

释,阅读和使用十分方便,很快在日本出现了众多的和刻本《史记评林》。这些和刻本《史记评林》基本都是李光缙增补的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基础,并将全书正文及注文加上训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意。江户时代和刻本《史记评林》因发行场所不同分为“八尾版”和“红屋版”两个系统,风靡日本,成为“人间流布俗本,而家家有此本”^①,对日本江户时代及后代的《史记》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随着《史记评林》的广泛流行,到宽政年间(1789—1800),出于对过分相信评注的反省,出现了与《史记评林》相对抗的潮流。他们将前代的《史记》注释和评论全部删掉,以《史记》原文的面貌问世,让读者通过直接读原文来学习和理解《史记》。这场排击《史记评林》运动的兴起是与当时日本学术思潮密切相关的,与“古文辞派”的代表人物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服部南郭等人的主张和倡导关系尤为密切。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儒学发展的全盛期。随着日本儒学的发展,在朱子学派之外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如古学派、阳明学派、折衷学派等。各学派的儒学家大多在各级学校及民间私塾中任教,其思想也通过生徒广泛传播。18世纪初,特别是享保元年(1716)以后,朱子之说开始衰落。宽政二年(1790),幕府颁布“异学之禁”,在昌平黉独尊朱子之学,以其他学派为异端,不准教授。但仍有学者根据自己的治学兴趣进行私人的研究与传授。各学派之间的学术观点各异并展开了学术争鸣,使儒学研究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江户末期,考证学盛行,一些学者以清代考据学为学术研究的新方法,专注于精细的训诂考据的研究。幕府官学为了顺应潮流,破格任用长于经传研究的安井息轩为昌平黉教授,这也充分反应了当时的学术潮流。

古学派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实质上是提倡一种新学,成为朱子学的反对派。古学派学者原多为朱子学追随者,后怀疑朱子学与孔子、孟子的原意不同,转而提倡古学。古学派学者的治学目的基本相同,但各人的思想体系有较大差别。

荻生徂徕(1666—1728),名双松,字茂卿,号徂徕、萱园、赤城翁,江户人,是古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早年奉行朱子学,后对朱子学产生疑问,形成自己的见解,创立“古文辞派”。古文辞派主张在从事汉诗文写作的过程中去理解和掌握古文辞的真义,强调理解经典的最好方法就是熟读经典,精通原书的字义及遣词造句的方法,摆脱前代注解的束缚,通过研读原文去探究经典的内涵。古文辞派认为解经必须通史,对《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书都有深入研究并重新加以注释。他们对史书的重视也推动了社会上对《史记》的研读和学习。荻生徂徕创办“萱园塾”,广收生徒,教授汉文学,提倡经史考证,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汉文直读法,反对一直以来的训读方式。他主张在沿袭已久的“俚谚抄”“俚谚解”之外,应该用“国字”即日语来解释中国的经传诸子以普及教学,以便使汉学在日本扎根,成为日本化的汉学。所谓“俚谚抄”“俚谚解”起源于室町时代,流行于江户初期。五山僧侣研读汉籍并开设讲堂传授给弟子,由此产生了把讲课内容抄写下来的“口语体笔录”,即以当时通行的俚俗谚语解释汉籍的一种解释方法。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新的注释形式,对日本人来说容易理解,利于接受。日本现存最早的口语体《史记》注

① [日]冈本保孝《影抄史记索隐校订凡例》,《况斋丛书》第二三册,和装写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释书是室町时代释桃源瑞仙的《史记抄》^①。获生徂徕所倡导的用通俗的日文来解释和普及汉籍的“国字解”，后来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普及汉籍教育的重要形式。

太宰春台（1680—1747），名纯，字德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信浓人。他成年后赴京都游学，听闻徂徕倡导古文辞学而入其门，但师生二人的观点时常相左。太宰春台一生致力于经史研究，不满宋儒的义理之说，作《朱氏诗传膏肓》，对朱子之说进行驳斥。他遵循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将朱熹对《诗经》的引申之说均称为“评语”，认为这些是脱离经典文本的无用之辞，应全部删掉。他遍注群经，有力地推动了反宋学空疏，提倡回归文本本身的潮流。但太宰春台因厌恶宋学的义理之说而走向极端，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文本的评论。他曾在《书史记评林后》中强烈表达了对《史记评林》的不满：

凌以栋著《史记评林》，旧注之外，增附《索隐》《正义》则犹不恶，唯《索隐》述赞极无味，其《评林》则为无用。其载《三皇本纪》，则为马史之蛇足。其载弇州拟短长说，李沧溟拟秦王辞，则为戏谑。此三者，皆无益于史学，而徒烦读者。要之凌氏之为斯也，其用者仅十一二耳，余去之可也。李光缙何为者而增补之，吾悲其意云！……予尝得《史汉评林》而读之，见其讥评无用者，悉涂抹之，恶其劳目也。嗟乎！王元美、徐子与好古之士，而作序以扬扞凌氏之举，抑何意哉？予尝怪焉。^②

太宰春台是从史学的角度指责“《评林》本”的无用及徒增烦乱，其《紫芝园漫笔》中有多处对《史记评林》体例的严厉批评^③。他反对附各家之说于《史记》正文的天头地脚，认为收录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及“述赞”合刻是画蛇添足，在《史记》正文前收录王世贞的《短长说》和李攀龙的《拟秦王辞》更是荒诞不经。他认为《史记评林》中有价值的评论只有十分之一二，其余应全部删去。他由《史记评林》推而广之，认为《汉书评林》及明刻六臣注《文选》都是明儒盲目尚古不加选择的思想的反映，比《史记评林》更加无用。他的主张虽有些极端，但对排击《史记评林》，推动白文《史记》的出版起了重大的作用。

服部南郭（1683—1759），名元乔，字子迁，称小右卫门，又号芙蕖馆、同雪、观翁，京都人，古文辞派学者。他大力提倡回归文本本身，对当时流行的评注本《左传》非常厌恶，故去掉所有注释，刊刻白文本《左传》，白文句读《文选正文》十二卷，并作《唐诗选国字解》七卷。服部南郭曾告诉弟子，自己年轻时即专心反复研读杜甫诗，久而久之，烂熟于心，写诗也能得杜甫诗精髓。不依赖前代注解，通过熟读原文来理解和学习原典是其学术主张的概括^④。

宽政年间排击《史记评林》运动的代表人物为越后村上藩儒服元宽、长门儒士多贺渐、大津儒士陆可彦。其间出现的白文本《史记》主要有以下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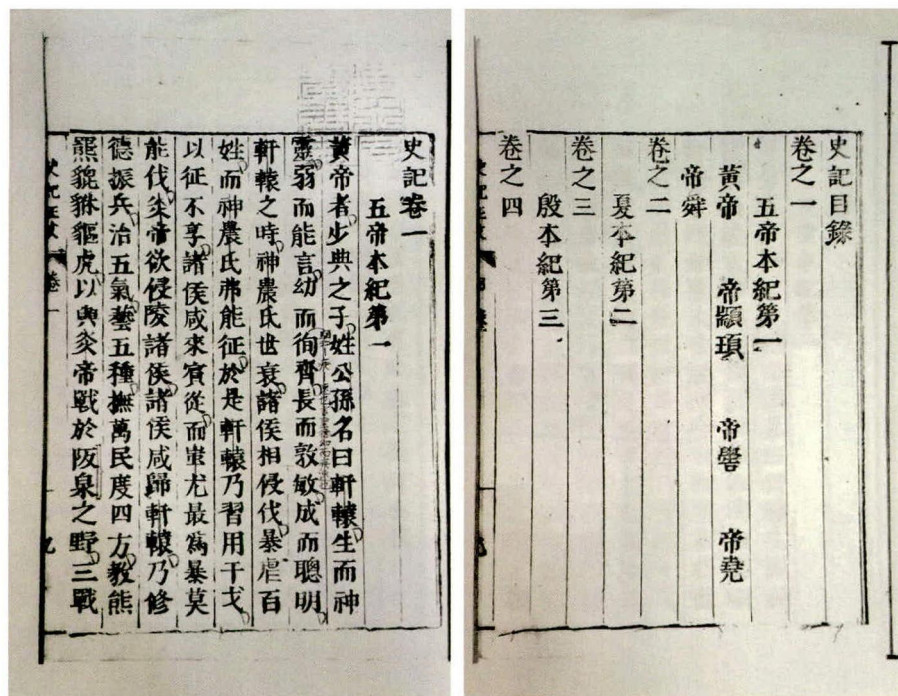
① 释桃源瑞仙《史记桃源抄》十九卷，卷首为《史记源流》《集解序》《补史记序》《索隐序》《正义序》《三皇本纪》，其后为《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正文中没有十表和八书。桃源瑞仙对《史记》的解释非常详细且通俗易懂，将《史记》与《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资治通鉴》比较参照，考订《史记》史实，指出《索隐》的错误。揭示《史记》中所蕴含的思想，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十分景仰。对后代日本《史记》研究影响深远。桃源瑞仙的《史记抄》现在日本存有多个抄本。刻本有宽永三年（1626）活字本。昭和十二年（1937）三ヶ尻浩又以宽永三年的古活字本为底本，辅以其他善本校订，影印出版。

② [日]太宰春台《春台先生紫芝园后稿》卷之十，江户小林新兵卫宝历二年（1752）刊本。

③ 参见太宰春台《紫芝园漫笔》，《崇文丛书》第一辑之四十四至四十八，日本东京崇文院昭和二年（1927）刊行。

④ 参见竹林贯一编《汉学者传记集成》，日本东京关书院昭和三年（1928）印刷，昭和二十年（1945）改定发行，第164—168页。

宽政四年（1792）磐船木活字版《史记》一百三十卷 服元宽编修



此本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二十四册。卷首为服元宽序，其中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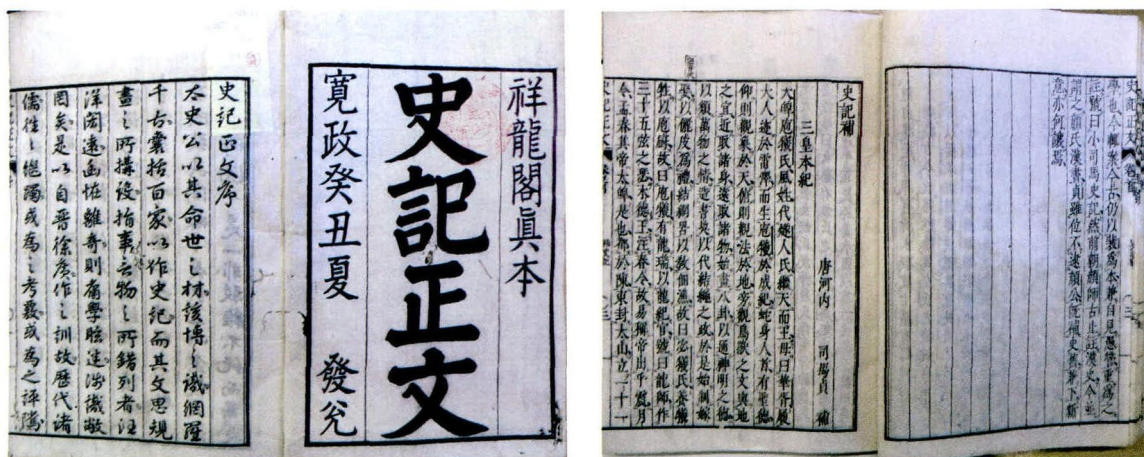
盖缀文之学，莫不从左氏、司马氏始，而国读句乙蠅鳞盈简，苟随其读，或至使辞之所存茫乎不知也。呜呼！读云，读云，国读云乎哉！宽先人从事南郭先生，先生已厌其如此，乃据左氏之正文，驱其蠅鳞，以授从游之士。先人亦以此大劝其道兮。宽欲效先人所资，复据司马氏之正文，驱其蠅鳞，用见文辞之所在焉。遂与僚友谋议活版之举。……课其众读手读此活字也，不复暇校，谬误焉，然犹庶几吾辈之士剖析字句，沉思文辞，则缀文之道或得于斯。今八表存其序，除其谱牒及众家序论不载，主于正文也。若夫有倒字脱落待读者正补云。

服元宽为磐舟郡村上藩文学臣，其父亲跟随服部南郭学习并深受其影响。服元宽继承父志，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评林》进行批判，认为《史记评林》过多罗列前代评点，割裂了《史记》原文，影响了读者对《史记》文章的欣赏和学习。为改变这一现状，他积极推动了无注本《史记》的刊刻，这对处于全盛期的《史记评林》的流行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作为主掌文学之臣，服元宽对《史记》十分推崇，认为“缀文之学，莫不从左氏、司马氏始”，而当时流行的《史记》刊本都加句读和训读，且多收录各家注解评论，这些附加到《史记》文本上的东西湮没了《史记》文字本身，使读者陷于训读和注解评论的包围之中，不知《史记》“文辞之所在焉”。所以服元宽此本删掉全部的句读、训读以及评论，只刊刻《史记》正文。其目录及篇章顺序全以《太史公自序》所列为准，十表仅存表序。《史记》正文或通篇不分段，或只在一人事迹结束另起一人时分段。目的是使读《史记》者“剖析字句，沉思文辞”，从而体会“缀文之道”，真正能体味到《史记》文辞之妙。

磐船木活字版《史记》的刊行，是当时日本学术界回归经典、探求本义的思潮的体现，也是对一直盛行的《史记评林》的反击。去掉注解、评论只保留《史记》正文，让读者通过阅读文本本身去体味和理解《史记》的精妙之处，其本意是恢复《史记》文本的本真，但其去掉全部句读和训读的做法，也会给读者带来不便。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磐船木活字版《史记》，有后人用朱笔对全书作了点断并加训读，在相关句下添加了简单疏解，天头抄录“三家注”。可见，在白文本《史记》和评注本《史记》之间如何把握一个适当的度，既方便阅读理解又不过度注解割裂原文，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宽政五年(1793)《史记正文》一百三十卷 多贺渐之仲音训



此本日本无穷会图书馆及池田文库有藏。二十册。卷首为皆川愿亲笔书写的《史记正文序》^①。他认为注释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史记》，但历代相传沿袭下来的这些注解，写满《史记》刻本的天头地脚，穿插在《史记》正文的字里行间，反而割裂了《史记》正文，妨碍了读者对《史记》思想及内容的理解。皆川愿还认为，附在《史记》正文之外的诸家注解，参差不齐，是非间杂。因为《史记》是传世之作，诸家注解多以此为依托，强生新意以引人注目，而《史记》是要在叙事之中蕴含治乱兴废之大道，后人读《史记》的重点也应在此，过分纠结于细节于事无补，反而容易走入歧途。皆川愿在《史记正文序》中表达的回归经典本身的观念与其所著《迁史戾柁》《史记淇园评注》的主旨是一致的^②。

皆川愿《序》后为多贺渐之仲所作《史记正文序》。多贺渐之仲生平事迹不可考。从其自序知其自幼喜读《史记》，深感掺杂在《史记》正文中的注评割裂了原文，使其头脑昏聩不能把握《史记》精髓。而在去掉注评只读《史记》正文之时却顿觉豁然开朗，于是开始有了刊刻《史记》正文的想法。他留意搜求《史记》善本，经过十几年的搜求找到十七种不同的《史记》刻本，但均不满意，后得到一元刻注本，较之他本似更接近《史记》原貌，于是以此本为底本，与其他十七种刻本对校，文字不同但其义两通之处均注明，难读之字用反切注音以方便读者阅读。

对其所刊刻的《史记正文》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其刻本删去了全部的注评，力图恢复《史记》的本真，但为什么还保留褚少孙所作之补作？对此多贺渐之仲的回答是：

世以为《史记》残缺多矣。或云《史记》景武《纪》、礼乐《书》等十篇，有录亡书，褚少孙补之者也。是以世或置而不读，或至于存其目删其书。如夫《武帝纪》，乃以其触当时之忌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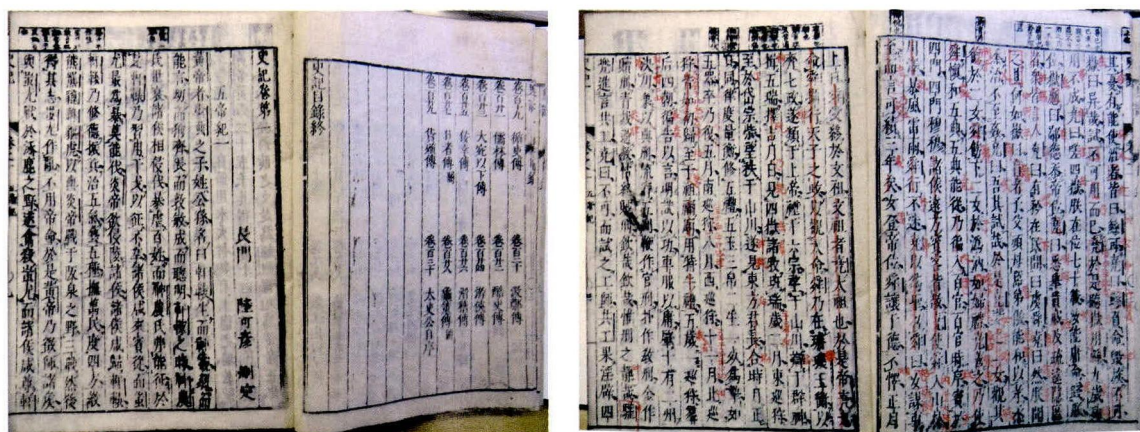
① 皆川愿(1735—1807)，字伯恭，号淇园，筠斋，京都人，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他自幼便注意收集古人用字之例，通过对文字的疏解来探求古典本义。对汉语的助词虚字多有探究。有《迁史戾柁》三卷、《史记淇园评注》一卷、《太史公助字法》二卷。

② 《迁史戾柁》分为三卷，前两卷为列传，后一卷为本纪、世家、书、表。此书体例是挑选《史记》各篇中的重点字句，在句下进行疏解。其注释均十分简略，十表中只收了《三代世表》《六国年表》《高祖功臣年表》，且每篇只有一条注释。对列传、八书的疏解较为详细，主要是断句、疏通文意以及对制度的解释。《史记淇园评注》与《迁史戾柁》体例不同。是按照本纪、世家的顺序，抄录相关篇章中需要疏解的字句。内容极其简要，或一篇数条，或只录篇名不加疏解，疏解内容主要是对文意的阐发，不涉及字义训释。皆川愿这两部《史记》注解之作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抓住各篇之中的关键，重在疏解篇章主旨，梳理文章脉络，注释重点字词，揭示司马迁为文之法。其点评方式明显受到明人文章点评的影响，但力求简洁。

故被删去，后人乃取《封禅书》而以补者，乃其删之，或未为不可矣。如其余则朱文公有言曰“《史记》未脱稿”，此固透到之见。以余观之，其未成者亦数种不同。……今尽删之，则反为扰害矣。且余唯订其文而已，如删则非余之志也。

多贺渐之伸结合自己研读《史记》的体会，认为在《史记》流传的过程中，其残缺及增补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复杂的过程。如果根据后人的说法就径直删掉《史记》中疑为后人增补的内容，这对恢复《史记》原貌有害无益。他强调其刊刻《史记正文》的目的在于恢复《史记》本真，以方便阅读，而不是对《史记》文本本身进行删削。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多贺渐之伸的《史记正文》在宽政十二年（1800）再版，文久二年（1862）出修订本，明治期间又重印。

宽政十二年（1800）《史记》一百三十卷 陆可彦删定



此本日本无穷会图书馆及池田文库有藏。十五册。书名题为“史记鍾伯敬删定”，无序，目录后正文首卷篇名下署“长门陆可彦删定”。其中十表及《礼书》《三王世家》《五宗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有目无文。此本以鍾伯敬辑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为底本。据《中国古籍总目》，鍾伯敬辑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为明天启五年（1625）沈国元大来堂刻本。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此本。又有清康熙五十二年胡彬抄本，题名为《鍾伯敬评史记》，南京图书馆藏。

据贺次君《史记书录》，鍾伯敬辑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对“三家注”删削很多，仅存十分之一二，错误很多，实不足道。但由于明代评点之风流行，此本迎合了时尚，再加上鍾伯敬在文坛的影响，故得以流行：

此本即从凌稚隆《评林》本出……但以《史记》十表无关文章大体，删除不载，但又自为年表图说，而错误零乱，毫无体例，读之将不知其所云。明人读《史记》喜评论，此本乃投其所好，故万历、崇祯间，如邹德沛、曹学佺辈，于鍾伯敬推崇备至。邹氏世古斋本即依此刻。称其题评“能得史公精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其实鍾伯敬乃拾杨慎、李元阳、茅坤、凌稚隆所为论说，稍加编裁，或间出己意，亦不过如评时文，争论文句之长短，堆陈浮词而已。……明自杨慎、凌稚隆而后，评论之风日烈，鍾伯敬辈其实无学，但好为高论，所以不惜重资以刻《史记》者，乃投合时尚，故求名之一哄耳。杨慎、李元阳、凌稚隆等虽主题评，据文义以论得失，考群书而发微意，尤各有其专长，若如此本，则卑卑不足道矣。（《史记书录》，第178—179页）

鍾伯敬名惺，作为竟陵派的创始者，他在明代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评点《史记》是以评时文的方法来评史，主要是对《史记》著作风格的评析。尽管在众多的明人评点中乏善可陈，但因鍾伯敬的文学地位，此书刊行后亦受到明代文人的推崇，明代就已有邹德沛以鍾伯敬本为底本刊刻的世古斋本《史记》，到清代康熙年间又有胡彬抄本，可见其影响。

陆可彦为天津郡儒士。其刊刻的删定本《史记》将原本上的三家注及鍾伯敬评点全部删掉，在天

头上有陆可彦对篇中重点字词的注音、释义以及对各本文字异同的校订。经核对可知陆可彦在刊刻《史记》时并未核对众本，其校勘只是对其所见前代校勘成果的摘录，很多内容引自徐广《史记集解》。此本刊刻粗糙，舛讹颇多。日本文教大学越谷图书馆藏有此本，多处有池田芦洲对字句讹误的朱笔修订。池田文库所藏此本《史记》被重新装订过，池田芦洲除逐篇校订正文文字外，还对每篇中的重点人名、地名、典制等进行解释，写在白纸上，装订在每篇之后，作为补充。

陆可彦选定锺惺的《锺伯敬评史记》作为其刊刻《史记》正文的底本，也反映出明代评点之学对日本学术界的深刻影响以及日本学者对《史记》文学价值的重视。直至明治时期安藤定格作《史记读本》仍提到并重视“《史记》锺伯敬删定本”。

宽政年间出现的这三个白文《史记》刻本，倡导了对经典本身的回归，对《史记评林》有所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分依赖旧注旧评的倾向。但排击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史记评林》全盛的势头，进入明治后，这种批评逐渐消失。

三

明治维新是日本教育界、思想界的一大转机。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日本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治维新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对幕府时代的学校体制的改革。江户时代的学校体制是以幕府官学、诸藩藩校、各乡校为主体，再加上私人兴办的私塾和家塾，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教育网络。这种教学体制在明治初年发生了变化。经过一系列的争论、变迁和改革，到明治十年（1877），全国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正式成立。在其学科体系中，原来占日本教育主导地位的传统汉学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由于当时日本社会还未稳定，学制改革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到明治十年九月，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增设了“和汉文”一科，和汉文的地位稍稍得以恢复。明治十四年（1881）在众多汉学者的共同努力争取下，东京大学文学部内又设立“古典讲习科”，任教的有中村正直、三岛毅、岛田重礼等著名汉学家，这一学科后来也造就了许多日本近代汉学大师。在全国的最高学府中，儒学经历了被排挤的过程后，最终又取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央学制变革的同时，地方的藩校也发生了变化。明治五年（1872）八月，日本发布使用大政官名称的学制，藩校停办，各地的藩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各藩校中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儒学流派更是首当其冲。明治五年三月禁官费学生入私塾，传统汉学的根基被极大地削弱了。

明治十四年（1881），日本先后制定了《小学校教则纲领》和《中学校教则大纲》，规定了中小学汉文学习内容，其后又对中学生应达到的汉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做了规定。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都有着与汉文有关的教育和组织。这使汉文教育在社会基础教育中占有了确定的地位。

作为汉文教育的重要教材，《史记》在这一时期也备受重视，一方面它仍然是汉学家们研究和教授生徒的汉学经典，一方面也在大学乃至中学的汉文教育中被作为课本。不同的需求使得这一时期的《史记》刊刻十分兴盛，并有不同的形式。明治前半期仅二十余年，就有大量的《史记评林》的重刊以及各种增补校订《史记评林》的刊刻。明治时期出现的增补校订《史记评林》主要有：

明治二年（1869），田中笃实等校订，玉山堂刊行《增订史记评林》。

明治十二年（1879），浪速五书房合梓，《明治三刻史记评林》。

明治十三年（1880），奥田遵校正，修文馆刊行《校字训点史记评林》。

明治十四年（1881），藤泽南岳训点，浪速同盟书楼刊《校订训点史记评林》。

明治十四年（1881），大乡穆等校订，修道馆刊《增订史记评林》。

明治十四年（1881），铃木义宗校订，印刷会社刊《明治新刻史记评林》。

明治十六年（1883），有井范平校订，报告社刊《补标史记评林》。

明治十六年（1883），石川鸿斋校订，凤文馆刊《增补史记评林》。

由于此时的汉学研究与江户时代相比已有所不同，《史记》作为叙事经典和文章典范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列传是《史记》中写得最精彩的篇章，此时应运而生《史记》列传“评林”一类的著作，如明治二十六年（1893）东京同盟出版书房出版的栗本长实《评林史记列传》七十卷，明治四十四年（1911）东京富山房出版的重野安绎《评林史记列传》七十卷等，成为汉学家们讲解为文之道的重要依据。

明治时期的教育改革使得平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江户时期汉学家专门的汉学研究相比，明治时期，包括《史记》在内的汉学经典成为了普及汉文学习的教材。在主要的大学和中学，汉文教育需要简明易懂的注释书。在明治时期国立的教育体制中，汉文教育只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部分内容。对于汉文基础不太深厚的大学生乃至中学生而言，《史记评林》显然超过了他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如何删繁就简、对《史记》进行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注解，成为当时汉学教育的需要。其后，一批作为教材的《史记读本》出现，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安藤定格《史记读本》 明治十二年（1879）东京松井方景等刊



安藤定格在《史记读本·凡例》中讲：

凌稚隆《史记评林》，行于我邦久矣。其评注无虑数百种，非无裨益，然博而寡要，涂涂相附，使读者趋彼舍此，认左作右，遂不得窥龙门之阃奥。锺伯敬有慨于斯，尽删之，特于栏外施一二音义，是亦失于太简。未见有烦简得中，而便诵读者。余常以为憾焉。尝讲习之际，窃不自揣，荟萃众说，采择其极简明妥当者，约其要，补其意，题曰《史记读本》。……庶几乎使读者免迷歧之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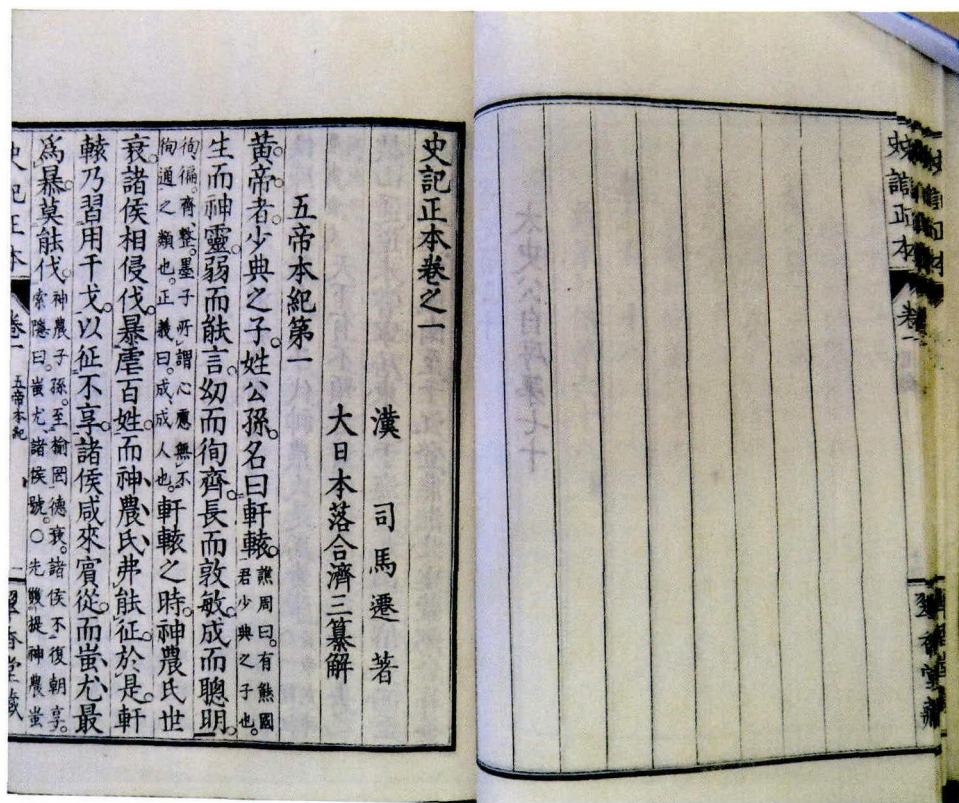
安藤定格此处所说“锺伯敬有慨于斯，尽删之……”，应是指陆可彦删定锺伯敬本刊刻的《史记》正文。其作《史记读本》“句读一依锺本参酌之，而如傍训，务从其雅驯者”。安藤定格认为完全没有对

文意的疏通，只是注释字音字义，也不能使读者准确把握《史记》的本义，“亦失于太简”。故其《史记读本》对《史记》全书都进行了训读，只保留简单的注释，一般是在一句或一段下集中注释字词和疏通文意，其后出现的《史记》讲义基本是沿袭这一做法。

此本对于《史记》各篇“篇名次第一依《太史公自序》，以故如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斥而不载”。对于班固所说的“有录无书”的十篇，尽管前代各家说法不同，“今不敢问其说之当否，姑存一百三十卷之原数”，“十表特揭其叙论而略其表者，让之《评林》本，为初学者省烦，其有表无叙者固不载”。不载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篇名及篇章次序的排列完全依照《史记·太史公自序》，保存《史记》一百三十卷的原貌，其原则是尽量恢复《史记》的本来面目。

安藤定格明确指出此书的宗旨在于方便读者诵读，故以简捷为原则，引用注释也不再注明出处：“此著特以便诵读为主，非敢供考证。故务从简捷，注间皆不标名氏以识别之，览者幸勿以剽窃僭入罪之。”对于地理方面的内容的注释也是力求减省，方便阅读：“凌本注间必揭水路山脉及郡邑之所在，然诸说纷纷无所措信，况山河形势岁变月迁，郡邑亦随沿革，在今日无由知其所在，不知亦于我邦人不为有害，故今特标示地名水名或山名等字，不敢揭其所在。”

落合济三纂解《史记正本》 明治十五年（1882）翠香堂版



落合济三在《史记正本凡例》中明确表示：

今古评注《史记》者，无虑数十百家，硕儒巨匠莫不读《史记》，读《史记》，又莫不评之。而近世坊间所行凌氏《评林》本，概搜罗而出之，可谓备矣。然惟求其备，故芜杂烦碎。或每一二句插注，或分裂本文，嵌训诂于句中。评鹭论断，彼蹈此袭，悉载而不泄。如如《索隐》《正义》，多是险怪迂谬，使神理灭裂，全无精彩。余故曰：读《史记》者，先披此五里雾，而后光采灿烂矣。是余所以不自揣而敢于此著也。

他认为《史记评林》的烦琐割裂了《史记》原文，芜杂的注文遮住了《史记》原来的光彩，所以在

《史记正本》中他采用了全新的体例：“《史记》本之于《诗》《书》《左传》《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文字古奥恢奇，往往多难解处。余时插先贤注释最易解者，又交鄙见而折衷之。勉贵简明，使易通晓。余希人读《史记》，不希人读训诂也。若欲钩深探赜，彼此求备，则世不乏其本，当就而索之，余所不敢。”即《史记正本》的宗旨在于“希人读《史记》，不希人读训诂也”，所以注释贵在简明，使读者能够借此通晓文意。“《史记》诸本，《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律书》《历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龟策列传》，采褚少孙所补；《礼书》采《荀子·礼论》；《乐书》采《乐记》，颇杂驳不纯，今悉删之，独存其标题，非敢以似而非却之，欲使《史记》复史公之旧耳。他日当别辑此类，作《补史记》。”落合济三将前代学者提到的《史记》中“有录无书”疑为后人所补的十篇正文全部删掉，只在目录中保留十篇篇题，在篇题下，注明“阙”。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是要恢复司马迁所作《史记》的原貌。这也是贯穿《史记》流传始终的“求真”传统的反映，而与此相对的就是以《评林》本为代表的“求全”的倾向。落合济三这种“求真”的思想明显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影响，而其《史记正本》的编纂方式在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治后期以来出现的大批《史记》国字解和《史记》教材，也大多将《史记》“有录无书”的十篇删掉正文，只保留篇题。对于前代学者附加到《史记》上的很多微言大义，他也不苟同。他认同朱熹关于《史记》是草创未成之作所以记载存在矛盾舛误之处的观点，努力剥去前代学者加在《史记》上的光环。这是其力求恢复《史记》本真的思想的又一体现。落合济三只针对《史记》原文进行评注，不去关注《史记》与其所援引之书在文字上的不同。他在《凡例》里明确表示：“太史公作《史记》，集《诗》《书》以下百家之书，以己权度出之。每用古书，或少改字句，或特用虚字为点缀，故余于其间亦唯为之评注，不必本于原书。盖余眼中独观史迁之文，不观《诗》《书》百家之文也。”

东汉时班彪、班固父子就已关注司马迁作《史记》时所征引之书，其后历代学者继续深入探讨。在《史记》研究史上，很多学者将《史记》所引各家之说的原文抄录下来，与《史记》逐字比较，据此指出《史记》的错误或探究挖掘蕴含其中的太史公深意。中国明代的《史记评林》以及日本昭和时期出现的《史记》注释集大成之作《史记会注考证》和《史记补注》，都大量抄录《史记》所引之书的原文。而落合济三《史记正本》只关注和疏解《史记》原文，不去过分追根溯源，这种处理方法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司马迁融合各家说法，又自成一家之言，过度关注《史记》对原书的改动和加工，特别是关注一些对于文意和史实记述并没有太大影响的差异，如增加虚词、改写翻译等，对准确理解《史记》及把握司马迁的思想并无益处。

对于《史记正本》的体例，落合济三还做了以下说明：“读史之法，须先晰文理，文理晰矣，一篇大意，明如观火。余于此书，首截大段，次分小段，看章法句法，示照应接续，欲使读者晰他文理。若夫逐字逐句而解之，或有所不通，余不任其咎。”“本纪备体记事，‘岁大饥’，‘彗星见东方’类，段落极短，或一二句，七八字，不堪划断，故特省之。”可见，其对《史记》文义的疏解重在阐明文理，而所谓文理即整篇文章的篇章结构，章法句法，把握住这些，文章的内容自然也就容易明了。所以此书重在分段串讲，不重在做逐字逐句的训释解读。落合济三这里提到的读史之法，其实还是从文章赏析的角度来读《史记》。江户时多贺渐之伸作《史记正文》也是强调学习《史记》“文辞”，可见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史记》一方面是被看作史书，一方面也是被作为文章的典范来学习，其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都备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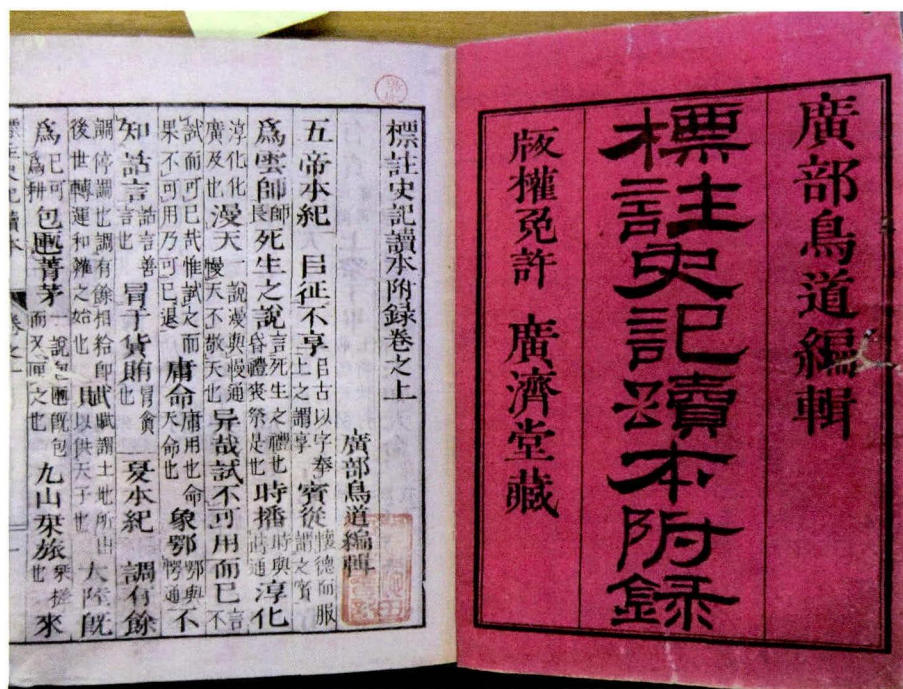
与考据学者专注于训诂考证不同，落合济三《史记正本》仍是学习明代学者评点文章的方法，可以说在这方面与《评林》有相通之处。包括从其具体的评点方式也可看出明代学者评点《史记》的痕迹：“此书字边施黑白圈点，若批若画，以示大旨所在。及照应段落，但黑白圈点，于一大段若一篇中，相为照映，非终始据一例也。要在读者了解。”清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是日本学者非常重视的《史记》评论之作，在日本有很多翻刻本。明治时期出现的续刊补注《史记评林》中，大多补入其

评论。对此书，落合济三也有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吴氏《论文》，以文论文则可矣，然时有近穿凿附会、粉饰夸耀处。殆使人疑片言只字无不出于作意者，古人用意，恐不当如此。大约古之人出言为文，自然节族，为照应，为抑扬，为开阖斡旋，为波澜顿挫。犹辞令言语，自有首尾次第，始达其意，非如后生据古人法门，视题拟体类也。故论文之说，余多不取，独于其示照应关键及评语简明，足以启发吾人者，取其一二耳。”他认为，吴见思对《史记》文章的照应关键之处的点评以及一些对文意的简单概括是可取的；而吴见思多用后代学者的论文之法去评点《史记》，而不知在司马迁写作《史记》时，这些后代人精心总结的为文之法并不存在，更多的是一种感情自然流露直抒胸臆的表达，即“出言为文”。用后代既成的为文之法去解读《史记》是穿凿附会。这一见解是十分精到的，并适用于包括《史记》在内的整个古代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范畴。

落合济三最后在《凡例》中说明：“此书系于十二三年前之著。时为塾生讲读，随读随批之，殆致卒業。其后东西奔走，藏之行李，今春从官在东京，退食之暇，再出而考检之，又补其阙。”据此可知此书是落合济三在明治初年为学生讲课的讲义，十二三年后才最终整理成书。这种教材方式，既是其学术思想的概括，也是当时学者为适应新的教育模式而对教授《史记》做的顺应时势的调整。

《史记正本》的体例是将包括“三家注”直至清吴见思《史记论文》在内的前代各家注释择其要附于《史记》相关句下，其后以“济按”的形式标明自己的见解。“济按”主要是指指出前代各家注释释义的不同，总结段意及司马迁为文之法。以《五帝本纪》为例，重点字句均用圈点标出，提醒读者注意。相关句下所保留的前代注释，基本都是对字词音义的注释，且在可以作为一段的地方会注明并总结段意。如：“一段。叙黄帝克神农，禽蚩尤，为天子。”“一段。叙尧顺天授时，正岁，兴农功。”此外还多有对《史记》叙事风格和文笔特色的评点。如“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一句字旁均用墨点标出，句下“济按”“一句起下文”，揭示此句的重要性。再如“与上《黄帝纪》一样叙法，详略互见，潜心照读，思过半矣”，点评叙事之法。此本所收前代注释及落合济三自己的按语都非常简明，以疏通文意和提示文章重点为目的，十分适合作为阅读《史记》的教材使用，是同类“读本”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广部鸟道《标注史记读本》一百三十卷 明治十五年（1882）广济堂藏版



与落合济三《史记正本》同一年出版的还有广部鸟道《标注史记读本》一百三十卷。此本在一百三十卷《史记》正文之外，还有《附录》两卷，上卷是逐篇抄录重点语句进行疏解，下卷是对重点字词进行注音。这种将正文与注音释义分开刊刻的方式与《史记评林》将各家注释及评论穿插抄写在正文之间的做法很不相同。随着社会教育环境及汉学地位变化，过分繁复的注解和评论已不适合学生阅读和学习《史记》的需要，甚至影响了正常的阅读和对文意的理解。以《附录》的形式标示重点语句并注音释义，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此本特色。

池田芦洲《校注史记读本》 明治二十六年（1893）益友社版



池田芦洲在明治二十四年二十八岁时开始了校注订补《史记》的工作。《校注史记读本》卷末的识语中讲：“余校《史记》，起于明治廿四年首夏，终廿六年杪秋。唯《天官》《河渠》《平准》三书则未及也。计应记年之十二月而全竣工。若夫润色参订之，至白首，未得完也。”《校注史记读本》以当时日本流行的《史记评林》本为底本，以其所藏明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单刻本，明嘉靖九年、万历二十六年两个三家注合刻本参校，将文字异同在相关句下注出。

全书之首为《例言》，叙述此书的缘起及体例。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 不收录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和清吴见思《史记论文》中的评论。池田芦洲在其《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中对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和清吴见思《史记论文》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在其《校注史记读本》中并不重点收录此二家的说法：“凌以栋《评林》主论事，吴齐贤《论文》主评文。夫《史记》起轩辕迄汉武上下二千余年之事。其事与文并千古奇观也。二氏之著岂可已焉乎？然今此编于二者不概及者，著各有所主也。”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池田芦洲已有作全面的《史记》集注即《史记补注》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此本注释力求简要的宗旨。

2. 对“三家注”不是全部收录，只是择其要而录之：“考群史《经籍》《艺文志》所载，古来注《史记》者不下十数家，而存于今者寥寥司马、裴、张三家耳，故今之读史者不得不据之，然其说时不免有谬误。此编初欲备举三家注，别录诸儒异说以驳正之。以其涉浩瀚止，今于三家注独择其醇者录之。”

3. 对《史记》内容的考辨一般只关注重大记载的失误，至于像各篇具体年月记载的误差不在其考辨范围之内：“年月差误，累见叠出，指不堪缕，今不暇复辨。因独订其大者不及细者，好事之士取各篇相照，自当辨其误，亦攻史之一端也。”

4. 对地名的注释较为简略，准备做专书考证《史记》地理方面的内容：“地理之学，读史者第一紧要，然亦非卒卒可毕。今独注某为地名，某为山名、为水名、为泽名耳，余一从略。他日将著《史记地理考》一书以补其阙。”

5. 对《史记》中律历、天官、医方、龟策只是对字义词义的注释，不涉及专门知识的疏解：“在史中若律历、天官、医方、龟策，皆为专门之术，固非余辈儒生所尽辨。且诸术至后世加精，若欲穷之，世自有专书，何必于此？是此编所以于诸术独训解其文义，不及其术也。”

6. 对于他家之说，备举姓名，不埋没他人之功。自己的见解以“胤案”标明。“凡引禹域人，必备举姓名……至引我邦先辈，则每卷首出列其姓与号，已下略姓，其无号者书名。”“凡句首不书‘某曰’者，俱系生平所闻及管窥。其至若厕于前人诸说间辨其是非，必书‘胤案’二字以别之。”

池田芦洲《校注史记读本》对三家注及旧注保留很少，只是在相关句下保留最重要的注解，注解内容主要是注音释义，注释人名、地名、官名，校勘文字，间有对文意的疏解。其中池田芦洲自己的注解很少，偶有“芦洲曰”阐述己见，并不如其《例言》中以“胤案”二字以别之。

《校注史记读本》本是池田芦洲读《史记》时随手做的笔记，并未准备马上出版。因益友社主人登门求书，推辞不过，于是将自己多年积累附于《史记》原文相关句之下，又补充其新近获得的前代注释，特别是补入了张文虎、俞樾两家的说法。该书被校讎一遍之后交益友社出版，定名为《校注史记读本》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史记》读本的迫切需要。

与前面几种《史记读本》相比，池田芦洲《校注史记读本》又有不同的特色，其变化体现出在明治后期直至大正、昭和时期，在大量用作教材的《史记》读本出版的同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对《史记》进一步深入研究，专供研究者使用的《史记》研究专著也开始出现。

四

明治时期各种《史记》读本的出现和流行反映当时汉学教育发展的需要，这些《史记》读本的出现又促进了汉学教育的发展及《史记》的进一步普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教材的《史记》读本也不断改进。明治以来，日本大学生及中学生的汉文基础不可与前代同日而语。在这种背景下，由通俗易懂的“口语体笔录”发展而成的“国字解”重新开始流行。自明治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开始，为适应当时汉学教育读者群的需要，一批讲义体形式的《史记》教材相继刊行，用口语的、平易的解释帮助研究汉文的学生阅读和学习《史记》。明治末年起的在日本出现了和译本《史记》，大正时期（1912—1926）出现了《史记》全书的通俗译本，昭和后期开始出现了完全独立于原文的口语译本和面向大众的《史记》普及读物，《史记》的读者群更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在进行着专门而深入的《史记》研究工作，出现了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等代表作。直至今日，在日本仍存在着多个《史记》研究的学术团体，《史记》研究的专著及论文也不断出版，涉及《史记》的版本、校勘、注释、评论等多方面，其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可以说，专门深入的研究与普及推广是《史记》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两条一直并行

的轨道。

池田芦洲在《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对明治以来《史记》在日本的传播有准确的描述：“明治、昭和时代，从大学到中学，往往以《史记》为课本，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德川时代《评林》的翻刻几乎仅限于‘八尾’‘红尾’两种，然而，到了明治时代，很快就见到了十多种开雕本，此绝非偶然之事。大正、昭和以至今日，或是新刊，或是旧版复刻，或是国译，或是国字解，或是抄本。这些书籍的出现，实为可喜之现象，迅速在我国汉籍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①

日本学者唐泽富太郎曾提到教科书对日本教育的重要性：“教科书创造了日本人，教科书不只是造就了一部分国民，而且给广大民众以极大的影响。因以往的日本教育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故其影响极大。”^②《史记》作为日本汉学教育中重要的教科书，对日本的教育乃至日本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时期日本汉学教育的特点。

〔作者简介〕 杨海峰，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汉唐〈史记〉研究论稿》等。

（责任编辑 孙少华）

① [日] 池田芦洲《史记在我邦的价值》，池田英雄《前编“史记解题”·后编“史记研究解题书目稿本”新编》，日本长年堂昭和五十六年（1981）版，第356页。

② [日] 唐泽富太郎《教科书之历史》序，日本创文社昭和五十五年（1980）版。